



名家名作 传世经典

最经典、最清新、最淡雅的朱自清作品集
收入最全面、文字最优美、情感最真挚、思想最深刻

朱自清经典 大全集

朱自清 / 著

至真至美的大师作品 深刻尔雅的文学经典
典藏百年的美文精粹 文字流转的盛世华章

阅读最经典的朱自清作品集，了解他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家、学者和爱国民主战士的一生，了解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和对我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从他朴实、正直、谦虚、诚恳的做人态度中，从他求真、求实的严谨创作态度和治学态度中，从他所表现的优秀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中，汲取养分。

中国华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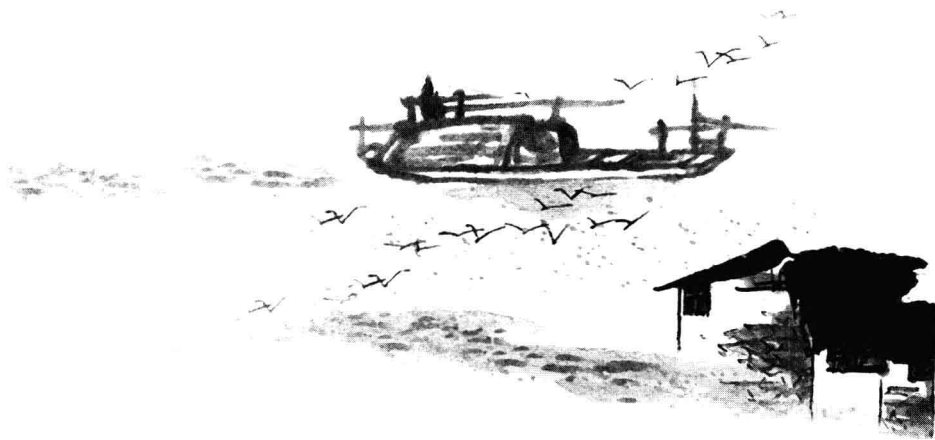
名家名作 传世经典

朱 自 清

经典大全集

(第四卷)

朱自清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明社会的时尚，不去看好像短着什么似的。这因为两个戏曹禺先生都是作者；而曹禺先生的戏，出演的成绩是大家都知道的。再说这回是他自己导演，也给观众很大的盼望。还有，两个戏的演员，很多轮老手，足够引起观众的信心。这两个戏的出演确是昆明一件大事，怕也是中国话剧界一件大事罢。

观众看了这两个戏，可以说是满意。在这种物质条件下能有这样成绩，真是不容易！从演员的选择与分配，对话的节奏，表情的效果，舞台的设计等等，可以看出导演以及各位演员各位职员都已尽了他们最善的努力。这是值得感谢的！有几个在北平住过很久的朋友说起，拿北平出演的话剧来比这一回，这一回确是更进步了。将剧本的难易和演出的难易合着说，他们的话是不错的。但是这一回的排演究竟还嫌匆促一些，对于剧本本身不免还有未能发挥尽致的地方。而剧本本身，特别是《原野》似乎也还有可议之处。观众春秋责备贤者，不满意的地方也不是没有的。

先说《原野》。观众对于第三幕的意见最多。在我自己，看到第二幕开幕时，觉得已经移入戏的氛围里，好像不在戏园子里似的。这种移情作用很有味。但是第三幕开幕以后，我却觉得渐渐失去了那氛围，又回到戏园子的池座来。我们即使不能说第三幕的头三场都是多余，但至少可以说是太多了一些。太多了，紧张的反反而显得松懈了！我也想过，若是能有旋转的舞台，这三场的效果也许好些。但是，有那么多我的话，却没多少戏，即使有旋转的舞台，怕也紧张不了多少。

原作者似乎很重视这一幕，从剧本的名称可见。他是要表现一种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要表现在仇虎的恨与爱的冲突里。仇虎因焦阎王的仇恨杀了他的儿子焦大星；焦大星却始终是仇虎的好朋友。仇虎杀了焦大星，占了大星的妻金子，可是他有些悔。他本也想害了焦阎王的孙子，焦大星前妻的孩子，小黑子，可是小黑子让祖母焦大妈当是仇虎，一铁拐杖打死了。这可真惨！这本不关仇虎的事，可是他有些怕，他想着他短不了是起祸的根苗呵。一点儿悔，一点儿怕，加上黑夜，树林子，再加上庙里的鼓声，焦大妈叫小黑子的魂的声音；更多点儿悔，更多点儿怕，是可能的。这时候见一些鬼，也是可能的。可是不必太多，不必太占时候，阎王和牛头马面似乎也都不必。那么着，三场并一场，许不大离了。那么着，仇虎和金子才有戏做，不至于只是重复的单调了。

有人说这一幕诗的成分比戏的成分多；不错，重复的单调正是诗的表现。但这里需要的是戏，不是诗。相信设计人在这一幕的头三场所费的心思比别几幕多得多；这当然应该感谢。不过我们似乎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特别是第一二幕那么经济，第三幕来了这么个大尾巴，老觉得不大称似的。在第一二幕里，对话很紧凑，也很波俏；是说话，不是演说，也不是背书。

这是活的；第三幕里尤其见好。还有金子那几处快拍子的话，不但能表现泼辣的神气，并且是舞台语言节奏的新试验；中国话剧的演出里，似乎这还是第一次。这试验是成功的；这节奏是可以增加舞台语言的丰富的。

对话的聪明漂亮教观众觉得仇虎和金子都是现代化的人。复仇也许可以算是原始的母题，但仇虎这个角色不够单纯的。有些观众觉得仇虎有时候演得还不够劲儿；这一部分也许由于演员体会得还不到家，一部分也许由于这个角色本身性格的矛盾。（仇虎的服装太像旧戏里的武生，更增加这矛盾的程度）金子也不单纯；她和仇虎一般，热情里藏着一双冷眼。这一双冷眼是现代文明的表现；严格的说，中国像仇虎这样身分的囚犯，金子这样身分的乡下女人，怕还不能有这一双冷眼。演员的困难便在这里。他们不容易体会他们所要担任的角色。这回凤子女士似乎在竭力给金子隐藏那双冷眼，她竭力让金子在观众的眼里变得单纯些。但剧作者铸就的角色，演员所能改的究竟是有限的。

仇虎和金子两个角色，似乎不免有些欧化。别的几个角色却是道地中国的。许多观众都称赞常五；常五真是演得恰到好处，尤其在第一幕里。但平心而论，这个角色究竟容易见好；加上孙毓棠先生是老手，出色还不算难，焦大妈比常五繁重得多，樊筠女士能始终不懈的表现焦大妈的精明与狠毒，让观众恨她怕她，是很难得的。可惜声音还不够苍老，但这没有法子。焦大星性格的懦弱和处境的尴尬使他成为一个难演的角色。李文伟先生在序幕里所表现的左右做人难的情形，幽默而不失真切。但在第二幕里，就觉得不够真切；这幕里的焦大星似乎太懦弱了些。可是在要杀金子的时候，他并没有落到旧戏的程式里去，也就算不错了，白傻子这角色最容易染上文明戏的味儿，但是，没有。这个戏，各位演员都认真的想做到家，想做到恰如其分；没有一个人过分夸张自己的角色。这是话剧，不是文明戏，界划井然。这是一个大进步。

次说《黑字二十八》。这是一个抗战戏，可是标语口号极少；作者是在另出手眼的。这个戏和《原野》不同。《原野》是要表现一个哲学，这个戏却似乎重在表现一个故事；故事里包含着抗战的信仰，却不是哲学。《原野》里的哲学，不论表现了多少，它可是悲剧，觉得沉重些。《黑字二十八》所暗示的是大家都会接受的抗战的信仰，只要标语口号不多，故事便可一新耳目；这是喜剧，觉得轻快些。

《原野》角色少，职务太重；这个戏角色多得多，大家不致像演《原野》那样吃力。角色性格的解释和体会，也简单得多。这回是由全市话剧界联合演出，人才济济，成绩自然不错。在一般的观众，也许觉得这个戏更有意思些；不但是有关抗战，故事也热闹些。可是这个戏角色究竟太多，排演大约不很容易；各位演员驯熟的程度似乎不大一样，在台上的步调也

就不很均齐。即如第二幕范乃正对瑞姑那种严厉的神气，乍见演出，简直有点莫名其妙。这里表演上似乎有些脱节。不过就全戏大体论，还不差什么罢了。

第一幕似乎最紧凑，穿插得最波俏。这还是对话的作用。第二幕次之。第三四幕便觉得杂乱些。这个戏注重故事的场面，不注重人物的性格；戏里似乎没有个性，只有类型。最显著的类型是玛，这是用来讽刺的。玛的对话不缺少幽默，风子女士很能表现出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杨兴福内心的冲突，曹禹先生真刻画入微；但这角色似乎也还是个类型，邓疯子疯得恰好，不疯的时候可太轻描淡写了。特别是末了儿抗敌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那几句演词，未免太不像真的了。这是用得着口号的时候；一味避免，也是不必的。夏晓仓可算老成；刘瞪眼也活泼泼的。沈树仁是力作，但公园里那许多声“是，大佐”未免过火；也许这是剧本的疏忽罢。

1939年9月10日。

《西南采风录》序

古代有采风的传说。说是每年七八月间，天子派了使者，乘着轻车到各处去采集歌谣。各国也都设着太师的官，专管采集歌谣。目的是在“观风俗，知厚薄”，一面也可以供歌唱。这叫作采风，是一种要政。这传说有好几种变形。有人说是在每年四月开始农作的时候，行人的官摇着木铃子随地聚众采访歌谣。又有人说，男女六十岁以上没有儿子，便叫他们穿上花衣服带着乐器，去采访歌谣。这些都说的很认真，可惜都不是实际的制度，都只是理想。原来汉武帝时确有过采集歌谣的工作，那完全是为了歌唱。一般学者看了这件事，便创造出一个采风的理想，安排在美丽的古代。但后来人很相信这个传说。白居易曾经热烈的希望恢复这个制度，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原是不曾有过的。

民国六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开始征集歌谣。他们行文到各省教育厅，请求帮助。一面提倡私人采集。这成了一种运动。目的确不是政治的，音乐的，而是文艺的，学术的。他们要将歌谣作为新诗的参考，要将歌谣作为民俗研究的一种张本。这其间私人采集的成绩很好。二十年来出了好些歌谣集，是很有意义的“材料的记录”。这些人采集歌谣，大概是请教各人乡里的老人孩子。这中间自然有许多劳苦艰难，但究竟是同乡：方言和习惯都没有多少隔阂的地方，比在外乡总好办得多。这回南开大学的同学山东刘兆吉先生在西南采集歌谣，却是在外乡；这需要更多的毅力。刘先生居然能采到八百多首，他的成绩是值得赞美的。

刘先生是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的一员，他从湖南过贵州到云南三千里路费了三个月。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决定从事采歌谣的工作。一路上他也请教老人和孩子：有时候他请小学教师帮忙，让小朋友们写他们所知道的歌谣。但他是外乡人，请教人的时候，有些懒得告诉他；有些是告诉了他，他却不见得能够听懂每一个字。这些时候，他得小心的，再三的请教。有小学教师帮助，自然方便得多。但有的教师觉得真正的歌谣究竟“不登大雅”；他们便教小朋友们只写些文绉绉的唱歌儿充数。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刘先生只得割爱，因为他要的是歌谣。他这样辛辛苦苦的搜索，记录，分辨，又几番的校正，几番的整理，成了这本小书。他这才真是采风呢。他以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他将采集的歌谣分为六类。就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这就是西南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好诗。这中间不缺少新鲜的话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读了都可以增扩我们自己。还有“抗战歌谣”和“民怨”两类，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却可以看出民众的敌忾和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真可以“观风俗”了。历来各家采集的歌谣，大概都流传已久；新唱出来的时事歌谣，非像刘先生这样亲历民间，是不容易得到的。书中所录，偶有唱本。刘先生所经各地，有些没能采得歌谣，他便酌选唱本，弥补这个缺憾。但是唱本多出于文人之手，不同歌谣的自然，似乎还是分开好些。刘先生采集歌谣，也有些猥亵的：因不适于一般读者，都已删去。总之，这是一本有意义的民俗的记录：刘先生的力量是不会白费的。

1939年4月13日。

清华的民主制度^①

我们虽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组织，似乎还只是极少数。在这极少数当中，清华大约可以算得上一个。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气；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得的。

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民国十八年^②。十八年到二十年，这两年多实际上没有校长，但学校一切，如常的进展，于是从民主精神的表现，到民主制度的确立。这中间曾经过一回大风险，居然安稳的度过了。但

^① 本文载于1940年9月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6卷9期，这一期《清华校友通讯》是“梅校长（梅贻琦）任教母校25周年纪念专号”。本文就是为此而写的。

^② 1929年。——编者注

这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的话。

梅月涵先生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他和清华关系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爱护清华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难得的是他知道怎样爱护清华；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他并不是没有主见的；只看抗战以来，教授会、评议会不得已而暂时停顿的时候，他的种种措施，就可以知道。但教授会和评议会的停顿，究竟是清华民主制度的损失，虽然校务会议还存在着。

梅先生比别人更明白这种情形。在学校迁到昆明第二年，一切渐入常轨的时候，他便和校务会议诸先生决定恢复教授会和评议会。一年来开会虽然还不多，但清华的民主精神已经重新活跃起来了。相信在梅先生领导之下，清华的民主机构，最近的将来就会恢复常态的。

但这个民主的机构，由大家的力量建成，还得大家同心协力来支持；梅先生和校务会议诸先生虽然领导有方，但单靠校长和少数人还是不成。——只要同仁都能像梅先生一样爱护清华，并且知道怎样去爱护，一切顺其自然，不去揠苗助长，清华的民主制度，前途一定是光明灿烂的。

1940年7月19日，平彝大旅社。

外东消夏录

引子

这个题目是仿的高士奇的《江村消夏录》。那部书似乎专谈书画，我却不能有那么雅，这里只想谈一些世俗的事。这回我从昆明到成都来消夏。消夏本来是避暑的意思。若照这个意思，我简直是闹笑话，因为昆明比成都凉快得多，决无从凉处到热处避暑之理。消夏还有一个新意思，就是换换生活，变变样子。这是外国想头，摩登想头，也有一番大道理。但在这战时，谁还该想这个！我们公教人员谁又敢想这个！可是既然来了，不管为了多俗的事，也不妨取个雅名字，马虎点儿，就算他消夏罢。谁又去打破沙缸问到底呢？

但是问到底的人是有的。去年参加昆明一个夏令营，营地观音山。七月二十三日便散营了。前一两天，有游客问起，我们向他说这是夏令营，

就要结束了。他道：“就结束了？夏令完了吗？”这自然是俏皮话。问到底本有两种，一是“耍奸心”，一是死心眼儿。若要耍奸心的话，这儿消夏一词似乎还是站不住。因为动手写的今天是八月二十八日，农历七月初十日，明明已经不是夏天而是秋天。但“录”虽然在秋天，所“录”不妨在夏天；《消夏录》尽可以只录消夏的事，不一定为了消夏而录。还是马虎点儿算了。

外东一词，指的是东门外，跟外西，外南，外北是姊妹花的词儿。成都住的人都懂，但是外省人却弄不明白。这好像是个翻译的名词，跟远东、近东、中东挨肩膀儿。固然为纪实起见，我也可以用草庐或草堂等词，因为我的确住着草房。可是不免高攀诸葛丞相，杜工部之嫌，我怎么敢那样大胆呢？我家是住在一所尼庵里，叫做“尼庵消夏录”原也未尝不可，但是别人单看题目也许会大吃一惊，我又何必故作惊人之笔呢？因此马马虎虎写下“外东消夏录”这个老老实实的题目。

夜大学

四川大学开办夜校，值得我们注意。我觉得与其匆匆忙忙新办一些大学或独立学院，不重质而重量，还不如让一些有历史的大学办办夜校的好。

眉毛高的人也许觉得夜校总不像一回事似的。但是把毕业年限定得长些，也就差不多。东吴大学夜校的成绩好像并不坏。大学教育固然注重提高，也该努力普及，普及也是大学的职分。现代大学不应该像修道院，得和一般社会打成一片才是道理。况且中国有历史的大学不多，更是义不容辞的得这么办。

现在百业发展，从业员增多，其中尽有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有志进修无门可入的人。这些人往往将有用的精力消磨在无聊的酬应和不正当的娱乐上。有了大学夜校，他们便有机会增进自己的学识技能。这也可以增进各项事业的效率，并澄清社会的恶浊空气。

普及大学教育，有夜校，也有夜班，都得在大都市里，才能有足够的从业员来应试入学。入夜校可以得到大学毕业的资格或学位，入夜班却只能得到专科的资格或证书。学位的用处久经规定，专科资格或证书，在中国因从未办过大学夜班，还无人考虑它们的用处。现时只能办夜校；要办夜班，得先请政府规定夜班毕业的出身才成。固然有些人为了学问而学问，但各项从业员中这种人大概不多，一般还是功名心切。就这一般人论，用功名来鼓励他们向学，也并不错。大学生选系，不想到功名或出路的又有多少呢？这儿我们得把眉毛放低些。

四川大学夜校分中国文学、商学、法律三组。法律组有东吴的成例，商学是当今的显学，都在意中。只有中国文学是冷货，居然三分天下有其

一，好像出乎意外。不过虽是夜校，却是大学，若全无本国文化的科目，未免难乎其为大，这一组设置可以说是很得体的。这样分组的大学夜校还是初试，希望主持的人用全力来办，更希望就学的人不要三心两意的闹个半途而废才好。

人和书

“人和书”是个好名字，王楷元先生的小书取了这个名字，见出他的眼光和品味。

人和书，大而言之就是世界。世界上那一桩事离开了人？又那一桩事离得了书？我是说世界是人所知的一切。知者是人，自然离不了人；有知必录，便也离不开书。小而言之，人和书就是历史，人和书造成了历史；再小而言之就是传记，就是王先生这本书叙述和评论的。传记有大幅，有小品，有工笔，有漫画。这本书是小品，是漫画。虽然是大大的圈儿里一个小小的圈儿，可是不含糊是在大圈儿里，所叙的虽小，所见的却大。

这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传记，第三部分也是片段的传记，第二部分评介的著作还是传记。王先生有意“引起读者研读传记的兴趣”，自序里说得明白。撰录近代和现代名人轶事，所谓笔记小说，传统很长。这个传统移植到报纸上，也已多年。可见一般人原是喜欢这种小品的。但是“五四”以来，“现在”遮掩了“过去”，一般青年人减少了历史的兴味，对于这类小品不免冷淡了些。他们可还喜欢简短零星的文坛消息等等，足见到底不能离开人和书。

自序里希望读者“对于伟大人物，由景慕而进于效法，人人以圣贤自许，英勇精进”。这是一个宏愿。近来在《美国文摘》里见到一文，叙述一位作家叫小亚吉尔的，如何因《褴褛的狄克》一部书而成名，如何专写贫儿努力致富的故事，风行全国，鼓舞人心。他写的是“工作和胜利，上进和前进的故事”，在美国文学中创一新派。他的时代虽然在一九二九以前就过去了，但是许多自己造就的人都还纪念着他的书的深广的影响。可见文学的确有促进人生的力量。王先生的宏愿是可以达成的，有志者大家自勉好了。

成都诗

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说是有些像北平，不错，有些个。既像北平，似乎就不成其为特色了？然而不然，妙处在像而不像。我记得一首小诗，多少能够抓住这一点儿，也就多少能够抓住这座大城。

这是易君左先生的诗，题目好像就是“成都”两个字。诗道：

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
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

住过成都的人该能够领略这首诗的妙处。它抓住了成都的闲味。北平也闲得可以的，但成都的闲是成都的闲，像而不像，非细辨不知。

“绕屋噪栖鸦”，自然是那些“据门撑”着的“古木”上栖鸦在噪着。这正是“入暮”的声音和颜色。但是吵着的东南城有时也许听不见，西北城人少些，尤其住宅区的少城，白昼也静悄悄的，该听得清楚那悲凉的叫唤罢。

成都春天常有毛毛雨，而成都花多，爱花的人家也多，毛毛雨的春天倒正是养花天气。那时节真所谓“天街小雨润如酥”，路相当好，有点泥滑滑，却不至于“行不得也哥哥”。缓缓的走着，呼吸着新鲜而润泽的空气，叫人闲到心里，骨头里。若是在庭园中踱着，时而看见一些落花，静静的飘在微尘里，贴在软地上，那更闲得没有影儿。

成都旧宅于门前常栽得有一株泡桐树或黄桷树，粗而且大，往往叫人只见树，不见屋，更不见门洞儿。说是“撑”，一点儿不冤枉，这些树惫粗偃赛，老气横秋，北平是见不着的。可是这些树都上了年纪，也只闲闲的“据”着“撑”着而已。

成都收市真早。前几年初到，真搞不惯；晚八点回家，街上铺子便劈劈拍拍一片上门声，暗暗淡淡的，够惨。“早睡早起身体好”，农业社会的习惯，其实也不错。这儿人起的也真早，“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是不折不扣的实录。

北平的春天短而多风尘，人家门前也有树，可是成行的多，独据的少。有茶楼，可是不普及，也不够热闹的。北平的闲又是一副格局，这里无须详论。“楚客”是易先生自称。他“兴嗟”于成都的“承平风味”。但诗中写出的“承平风味”，其实无伤于抗战；我们该嗟叹的恐怕是别有所在的。我倒是在想，这种“承平风味”战后还能“承”下去不能呢？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成都这座大城该不能老是这么闲着罢。

蛇 尾

动手写《引子》的时候，一鼓作气，好像要写成一本书。但是写完了上一段，不觉再三衰竭了。到底已是秋天，无夏可消，也就“录”不下去了。古人说得好，“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只好以此解嘲。这真是蛇尾，虽然并不见虎头。本想写完上段就戛然而止，来个神龙见首不见尾。可是虎头还够不上，还闹什么神龙呢？话说回来，虎头既然够不上，蛇尾也就

称不得，老实点，称为蛇足，倒还有个样儿。

1941年。

重庆一瞥

重庆的大，我这两年才知道。从前只知重庆是一个岛，而岛似乎总大不到那儿去的。两年前听得一个朋友谈起，才知道不然。他一向也没有把重庆放在心上。但抗战前二年走进夔门一看，重庆简直跟上海差不多；那时他确实吃了一惊。我去年七月到重庆时，这一惊倒是幸而免了。却是，住了一礼拜，跑的地方不算少，并且带了地图在手里，而离开的时候，重庆在我心上还是一座丈八金身，摸不着头脑。重庆到底好大，我现在还是说不出。

从前许多人，连一些四川人在内，都说重庆热闹，俗气，我一向信为定论。然而不尽然。热闹，不错，这两年更其是的；俗气，可并不然。我在南岸一座山头上住了几天。朋友家有一个小廊子，和重庆市面对面儿。清早江上雾濛濛的，雾中隐约着重庆市的影子。重庆市南北够狭的，东西却够长的，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雾渐渐消了，轮廓渐渐显了，扇上面着了颜色，但也只淡淡儿的，而且阴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说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带水却出落得这般素雅，谁知道！再说在市内，傍晚的时候我跟朋友在枣子岚垭，观音岩一带散步，电灯亮了，上上下下，一片一片的是星的海，光的海。一盏灯一个眼睛，传递着密语，像旁边没有一个人。没有人，还那儿来的俗气？

从昆明来，一路上想，重庆经过那么多回轰炸，景象该很惨罢。报上虽不说起，可是想得到的。可是，想不到的！我坐轿子，坐洋车，坐公共汽车，看了不少的街，炸痕是有的，瓦砾场是有的，可是，我不得不吃惊了，整个的重庆市还是堂皇伟丽的！街上还是川流不息的车子和步行者，挤着挨着，一个垂头丧气的也没有。有一早上坐在黄家垭口那家宽敞的豆乳店里，街上开过几辆炮车。店里的人都起身看，沿街也聚着不少的人。这些人的眼里都充满了安慰和希望。只要有安慰和希望，怎么轰炸重庆市的景象也不会惨的，我恍然大悟了。——只看去年秋天那回大轰炸以后，曾几何时，我们的陪都不是又建设起来了吗！

1941年。

文学与新闻

“文学与新闻”这题目可以说就是“文学与报纸”。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分下列三点来叙述：

第一点，我要说的是由白话纯文学到白话杂文学（本来，文学用纯和杂来分类，不大妥当，但我一时找不出另外的适当的名词来代替），换句话说，就是由创作到写作。民国八年以后，一般爱好新文艺的青年顶注意的是创作。在创作当中，顶早而且顶盛行的是诗。大概因为诗是适合于抒情写景，和青年人的气质相投，比较地易写；以及，不管是不是诗，只要有一种分行的形式便可以算数的缘故。后于诗发展的是小说。小说多了起来，诗就渐渐少了下去；抗战以后，诗的创作似乎已远不及小说的蓬勃，在成绩上也是如此。

再次发展的是戏剧，战前原来发展得很慢，战后才突然跃进而且普遍起来。

最后发展的是散文（这里所指的散文是狭义的，就是所谓小品文，并不包括论文）。比起前三者来，散文在抒情写景之外更接近于应用。这特色配合了当时的现实的要求，发展为一种新的文体，或叫做类型，就是所谓杂文。自然，写杂文顶出名的是鲁迅先生，因为他应用这文体在讽刺，暴露，攻击旧势力的弱点方面，是非常地有力量的。由于这种趋势，我们就可以看出纯文学发展向应用文学这一方面来的轨迹，或说是由创作到写作的路线。各位，乍看起来，“创作”和“写作”这两个名词底涵义似乎相同，实际上是大有分别，这，只要我们仔细一想便可以明白。

接着要谈到的是白话文的需要问题：

因为当时提倡文学革命，在“射人先射马，擒贼必擒王”的原则下面，就得先改革表达思想的文字，以便完成“借了文学的手段以达到改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目的。各位都晓得，要改革社会，必先改革思想，要改革思想，又必先要改革传达思想的工具：文字和语言，而文字又是语言的记录，所以，文学革命就要先改革表达思想的文字；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白话文比起文言文来，确实容易懂，容易学习，所以很快地就风靡一时了。

为什么纯文学成为时代的宠儿呢？我想，大概是由于当时从事白话文的青年多喜欢形象化和注意趣味，所以都偏向创作。不过，创作归创作，应用方面的主要的传达思想的工具还是以文言文居多，比如爱好新文艺的青年底家信，往往还是以“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来开头，就是。

不过，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到了现在，当时的青年已经都成为

中年了，在社会上也各自负起了一重责任。他们对白话文的看法和态度，比起前一辈来，宽容了许多。白话文由抒情写景而趋于实际应用，这正是时候，而且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倘不这样，白话文的出路是不广大的。

第二点，我要谈到白话文的发展方向。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创作的成绩。本来，白话文运动参加的人很多，但成功了而为我们所晓得的，却寥寥无几。可见创作这条路并非是人人都能通得过去的；而且，也可以看到，那些通不过的，在数目上也一定不会很少。由此，我们就可以断言：创作是相当艰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愉快的。

根据这一点，我愿意诚恳地贡献给有志从事文学的青年一个意见，就是：倘若你发觉到自己对于创作这条路并不大能够行得通的话，很可以走另外一条新兴的，宽广的路——新闻。我们可以把十年前的报纸的文体拿来和现在底比较一下，很容易看到白话文的成分是日渐地加多起来，文言文的成分则日渐地减少下去。现在，不但社评，通讯，特写等都渐改为白话，就是应用文件如：蒋委员长告国民书，政府文告等，也都渐改为白话了。当然，还有些告示，公文，电稿之类没有完全脱离文言；但可断言的是，这些改变，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第三点，我要说的是新闻中的文学。新近我读到一本曹聚仁先生著的书：《大江南北》。前面有一篇《新闻文艺论》，和我今天的所讲很有关系。那文中提到一个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应具备的三种修养：一、新闻眼，二、整理材料，三、艺术笔触。这三点有相互的关联，本应一起谈到的。不过第一点说到从事新闻事业者底眼光，观察能力，敏感……是牵涉到各人的才分，气质上的问题；第二点则说到如何处理材料，又关系到技巧的修养和经验上了；对于今天我所要讲题目，都不及第三点来得密切。所以，今天只就“艺术笔触”这一点来说一说。

在“新闻”这一范畴之内的“艺术笔触”，并包括一般的政治家发表言论的“吐属”，“含蓄”，“风趣”，“幽默”一类新闻材料，通过了新闻眼的摄取、选择、组织、融化，再适当地表现出来的新闻记者的手笔而言。这种通过了艺术的洗炼和照耀的材料，是更能增加新闻本身的力量。

我把这种材料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辞令

某些政治首脑，为了对于一种新发生的事件的保守机密，同时却又不给那些敏锐的“新闻眼”以适当的答复和满足，就往往采取一种“不知道”或“保留”的口气或态度来应付。这种办法，多见于外交家们对外的发言——一种巧妙的措词或辞令。比如下面这些我们由报上所看到的例子：

一、比如说“关于某某事件，在继续收到可靠的材料之先，未便奉告。”——这句话，实在只表示：“不知道。”

二、美国务卿赫尔回答某记者关于美远东舰队是否已开抵菲律宾这回事底询问说：“在君询问之前，我尚未知此事。”——是说：“不知道。”

三、威尔基氏对某问题的询问底回答说：“我想不起来曾有人这样说过”——是说：“不知道。”

四、某要人回答某机要问题底询问时说：“此事我在报上看到，方知。”——是说：“不知道。”

五、日本某相答复外界对于某现象底活动的询问说：“报上的舆论已足够表示了。”——是说：“不知道。”

六、罗邱会晤的事，美发言人称：“总统游艇正沿海岸徐徐前进中。”——未说所在地，等于说：“不知道。”

七、罗斯福召见海军舰队司令后回答新闻记者称：“我们在研究地图。”——等于说：“不知道。”

八、外界询及澳洲总理与罗斯福晤谈的内容底范围，澳洲总理答称：“我等所谈广涉到古今未来，而其范围又等于绕地球一周。”——等于说：“不知道。”

九、罗斯福回答某问题时谓：“此事诸君可自行判断。”——等于说：“不知道。”

十、某人要求某政治家发表对另一政治家之言论之观感，答称：“对某君发表之谈话，深感兴趣。”——“兴趣”如何？等于说：“不知道。”

十一、美劝南斯拉夫不加入轴心这回事，希忒拉称：“对此美之门罗主义行使至欧洲之事，颇感兴趣。”——也是说：“不知道。”

十二、小罗斯福来华，新闻记者询其来华印象，他说：“此行印象颇佳。”——也是说：“不知道。”

十三、罗斯福代言人发表总统对希忒拉之讲演之意见，谓：“希氏讲演时，总统适小寐，讲毕始醒，故对此讲演无意见表示。”——还是说：“不知道。”

十四、罗斯福代言人对外发表总统对松冈讲演之意见，谓：“总统无暇阅览松冈氏讲稿，故无意见发表。”——还是说：“不知道。”

第二类：暗示

一、日外相丰田贞次郎此次上台时，发表谈话，谓：“三国同盟时，本人适负责海军，故较熟悉，至于近三月来，对外交情况则较为模糊，此次上台，纯为学习学习……”——暗示对日苏协定有不尊重之意。

二、美国记者某谓：“美政府不欢迎除美以外之任何国家过问新加坡。”——暗示日本不得对新加坡染指。

第三类：描写

一、某记者报道英德争夺克里特岛之战况，描写德伞兵下降时之情形谓：“……自远观之，有如落英缤纷。”——使读者在严肃的紧张中，得到一种调剂的，中和的轻松之感。

二、当罗斯福当选为第三任总统时，记者描述其政敌威尔基氏拍贺电时之态度曰：“是日晨，威氏身披睡衣，慢啜咖啡，拍发对罗总统之贺电。”——由被描述者的闲适之状，我们看到威氏之宽大的政治家的风度及其对罗总统的敬意。

三、伦敦被炸时，某记者记述其情况曰：“彼时，我适卧于地板上写稿，随时有遭到生命危险的可能。”——虽所写为身边琐事，却也可反映出当时伦敦在空袭下的严重情形。

第四类：宣传

一、渝市四月二日被炸时，英大使馆亦遭波及，卡尔大使发言曰：“余愿以中国人之精神，接受此次轰炸。”——此种描述，一方面表示卡尔大使对我国之抗战精神的同情与敬佩，一方面也表示了中英邦交的敦睦。

二、随军记者记载官兵对日机投弹技术之评语谓：“能听到炸弹声已经算是很好的了。”——这种记述，表示敌空军人员因为大量的伤亡，以至把训练尚未完成的飞行人员都调到前线上来应用这一点。

三、英舰遭受四百公尺上空之德机追炸而未被击中，该舰司令曰：“此种技术恶劣之轰炸员，实应使之饱尝铁窗风味！”——此固表示对德空军之藐视，亦足表示出英人之幽默风度。

四、克里特岛被狂炸后，记者描述其情况曰：“多数青年均下海捕死鱼。”——此足以表示该岛居民不畏空袭。

五、希忒拉发表对英德战事的观察，谓：“二者必有一崩溃，但，决非德国！”这简直是宣传的宣传。

六、希忒拉作豪语曰：“英如在柏林投弹八千公斤、一万公斤；德即马上在伦敦投弹十五万公斤，二十三万公斤……”云云——更是宣传的宣传了。

七、罗斯福发表对苏德战争之观感，谓：“苏抵抗力之强大，即德国军事专家亦为之惊叹。”或问军事专家是否亦包括德之最杰出之专家希忒拉在内，罗氏言：“此问使余之谈话失去意义。”——这段新闻，在宣传的意义上是：“希忒拉不配称为军事专家。”

1941年8月。

钟明《呕心苦唇录》序

和钟明分别好几年了，今年夏天在重庆匆匆一见，谈得很高兴。他的工作很忙，工作的兴致很好。但那一见太匆匆了，没有来得及问他这几年的经过的细节；这些也是我乐意知道的。近来他让他的弟弟钟兴先生送来他七年来所发表的文字，说要出一本书，请我作一篇序，我细读了这些文字，仿佛听他自己告诉我这几年的故事似的，觉得津津有味。这就弥补了我们夏天见面时的缺憾了。

这些文字多半是议论和杂感，也有叙事的，题材虽然都是陈旧的踪迹了，可是读起来并不缺少新鲜的趣味。因为有些题材和我们关系太大，太切，我们不会忘记。而钟明那管笔圆转自如，举重若轻，也教人不会倦。这些文字里有许多处论到抗战前的中日关系，可以见出钟明的热情和苦心；当时读了他的议论一定会抑郁不堪的。可是现在读起来轻松得多了。我们抗战已上了第六年，而且胜利的日子越过越近了。我们毕竟抬起头来了。读钟明的这种文字，真像吃了橄榄在回甜。感慨和安慰交织在我的心里，这一段儿过去真在我眼前活着。

钟明的职务似乎不能离开宣传，可是读他的文字，并不觉得他在宣传。一般的宣传有时不免夸张，有时不免刻厉；这就教人不敢轻易相信，而且时有戒心，不容易跟宣传者打成一片。钟明的文字却只娓娓说来，不装门面，不摆架子，而能引人入胜。他能让读者和他水乳交融——至少在读他的文字时如此。他是一个很好的记者，虽然并未加入记者群。记者的写作，最要紧的是亲切；这正是钟明的长处。

钟明在《呕心苦唇录·自序》里说：“虽皆芜语，悉出至诚”，惟其“悉出至诚”，才能亲切有味。宣传与写作都不能缺少这种至诚的态度。他又在他的《第二集自序》里说：“其中典礼集会之词，标新立异固不可，机械陈腐亦不可，每殚精极思，广事征引，而学识肤浅，语焉不畅。”这也是至诚的态度的表现。钟明的文字读起来像流水一般，其实是经过一番惨淡经营来的。

钟明正在壮年，他的事业和文章都有无限的前途，本书不过发轫罢了，我们对于他的期望是很大的。

1942年，昆明。

三祝报章文学

一祝报章的世界化。现在无线电网繁密而敏捷，世界的每一角落息息相关，真是“天下一家”。在这种情形下，报章自然该具有世界眼。近来报章已经一般的注重国际新闻，并且多多翻译外国报章文字，引起国人更深切的注意。无论原因如何，这总是健康的倾向。不过这还不够。报章记事和论事，处处得放开眼界，看到世界这一整个儿。固然中国的报章有中国的立场，各地方的报章也有各地方的立场，但不该忘记世界是整个儿的。报章不该再是特权阶级的应声虫，该是民众的喉舌；而世界上民众的意志总是一致的。

二祝报章的学术化。报章负有教育的使命，得开通民智，提高民众的程度。“五四”运动以来，报章的副刊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很大。这些年刊物多起来了，副刊的作用才不大显著了。近来因为纸张和广告等原因，副刊更在若有若无之间；有些简直回到“五四”以前的作风，只能供茶馀酒后的消遣了。不过报章的学术化并不必需采取副刊的方式；若能在记事和论事时候，随处注意学术，也许比副刊还活泼些。现在有些报章翻译外国时论，不少带学术性的，是可喜的现象。报章的学术化就是要多带学术性，提高读众的趣味，决不是专门化——专门化是不相宜的。不过对于本国的重要学术消息，有些报章竟阙而不载，似乎是不可原谅的忽略。

三祝报章的白话化。报章要求广大的读众。要接近广大的读众，自然宜用白话，不宜用文言。“五四”运动以后，报章里文言已在逐渐减少，白话增多；而所用的文言也参进了不少的白话成分。并一律加了句读。这是大进步，给予一般读众便利甚多。照这样趋势，报章的完全白话化，原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我们如再加努力，便可以更快些。现在报章还不能完全不用文言，大概有两个原故。一是政府文告有些还是文言。二是白话应用文体还在创造中，不像文言有许多套子可用，用起来省力些。关于第一层，我们觉得政府文告已在逐渐多用白话，希望也有完全采用白话的一天。而且这种文告究竟占篇幅不多。我们最该注意的是第二层。我们希望各位记者先生努力多用白话作稿。开始也许得多费点气力，久了便会习惯自然。这为了广大的读众利益，是值得的。这更可以帮助我们的新文体新国语的完成，在文化上也有很高的价值。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他是该参加创造我们的国语的工作的。

1944年。